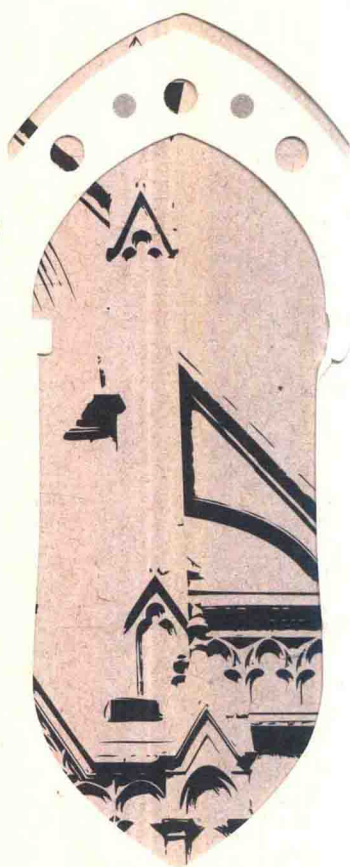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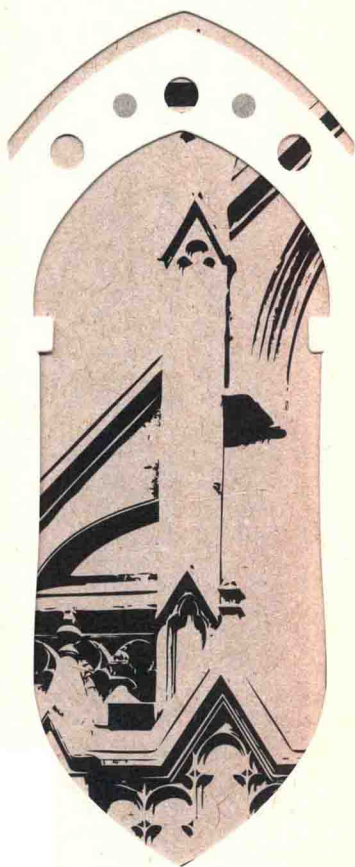


香港 天主教 傳教史

夏其龍 著
蔡迪雲 譯

1841-1894





目錄

004 序言 I

013 序言 II

018 詞彙表

027

第一章

早期在中國傳教的嘗試：
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

051

第二章

新嘗試的時候：
十九世紀中期

073

第三章

活在總務處的陰影之下

281

第七章

服務社會

323

第八章

挑戰政府

357

第九章

落地生根

第四章 發展本地教會

第五章
前線傳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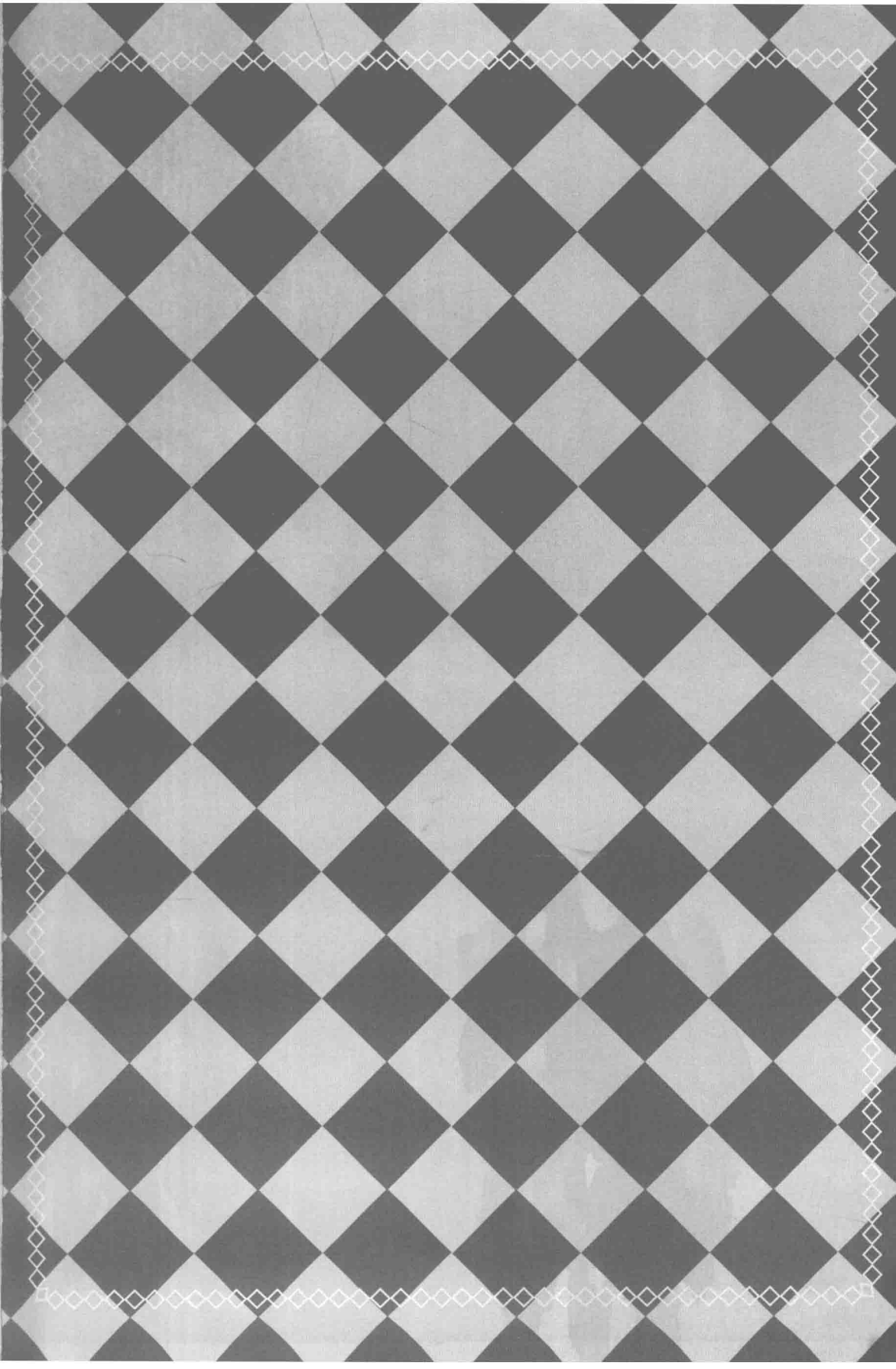
第六章 牧民與傳揚福音工作

385
總結

附錄

395 I 歷史檔案
408 II 歷史圖片及地圖
422 III 教會刊物
429 IV 列表及名單

458 參考資料
474 索引
484 跋





香港 天主教 傳教史

1841-1894

著者 夏其龍

譯者 蔡廸雲



序言

I

對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歷史作全面分析的文獻一直欠奉，本書正好填補這空隙。

香港天主教教會創辦於一八四二年，是少數從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開始便一直存在至今的機構之一。其成立的背景非常特殊：它的成立，是為了作為羅馬教廷把其在中國傳教區的總務處和財務處從澳門遷移出來的一個掩護。雖然這項計劃很成功，但是當中卻付出了代價。基於當時的特殊情況，香港天主教教會的領導人必須同時擔任教廷傳信部駐亞洲總務長（負責管理中國傳教區的財務事宜）和宗座監牧（負責傳教，即在香港從事牧民和傳教工作）兩項職務。這個安排開始初期，便已出現財務事宜與傳教工作之間的矛盾，以及到底以中國內地還是香港為工作重心等內部問題。在成立之後的最初二十年，香港天主教教會實際上是以處理財務事宜為其首要工作。直至一八七四年，羅馬教廷把香港天主教教會升格為一個宗座代牧區（Apostolic Vicariate），並委任高主教（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 1827-1894）為香港首位宗座代牧主教之後，內部矛盾的問題才得以結束，香港天主教教會才可以全身投入傳教工作，以及為本地中國籍和外籍人士提供教育及慈善福利服務，並在香港社會上擔當更積極、更明確的角色，扎根香港。

像在一幅大帆布上繪畫油畫一樣，有大筆畫的地方，亦有細緻描繪之處。

本書作者對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敘述分成多個層次，在概括地探討歷史趨勢的同時，亦詳細分析了當中一些團體和個別人士的活動和行為。透過這種表述方式，作者把客觀的歷史和人物的相互作用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在追溯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歷史根源方面分析，作者以天主教教會的工作擴張至中國內地，並在當地建立教會，以及英國和法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活動作為背景，探討了歐洲近幾個世紀以來的權力政治。以澳門為據點的葡萄牙，於十六世紀在東方稱霸，並擁有在中國的護教權。羅馬教廷一直對葡萄牙的這種霸道和囂張存在不滿，而當葡萄牙於十九世紀衰落至谷底時，羅馬教廷與葡萄牙之間的鬥爭更進一步加劇。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羅馬教廷在沒有得到葡萄牙完全同意的情況下，在中國建立了新的傳教組織，並對葡萄牙干涉其設於澳門的傳信部總務處甚表不滿。

同時，英國在東亞地區的帝國主義活動帶來了一個新紀元。由於英國影響了中國的開放，這不單為歐洲人和其他商人造就了商機，同時亦為傳教士滲入中國傳教提供了機會。而法國具野心地作出保護在中國的傳教士的聲稱，亦進一步鼓勵了傳教士可以在這種新的外交條件下在中國進行傳教工作。因此，一八四一年當英國佔領了香港的消息傳到羅馬之後，教宗頒發了一項法令在香港建立天主教教會。在收到這個命令之後，從一八三七年起便一直在澳門工作，並一直渴望獨立於葡萄牙的傳信部駐亞洲總務長若瑟神父（Joset Theodore, 1804-1842）迅速地執行。雖然當時的香港島明顯是一個並不發達的地方，其人口亦低至根本不足以建立一個獨立的天主教教會，而且作為英國殖民地，它的法律

地位亦未穩固，但是在這個時候倉促地建立一個天主教教會，明顯地只是為了逃避葡萄牙的保教權掣肘的一項計策。

歐洲國家的政治對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深遠影響還可見於其他方面。愛國主義的激增和單一民族國家的出現，導致天主教教會內的政策出現根本變化。隨著不同組織的傳教士紛紛抵埗，禍及歐洲的國與國之間的對抗也蔓延至香港。特別是，正如作者指出，意大利統一之後教廷失去了教皇國，令在香港的意大利教會領袖在他們認為是原則性的問題上變得更激進，以及對其他國家的組織更偏激，最後把自己置於四面受敵的境地。而最令人憤慨的衝突，就是宗座監牧兼意大利方濟會（Franciscan Order, OFM）的裴神父（Antonio Feliciani，又名傳安當，1804-1866）跟他的繼任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科主教（Theodore Auguste Forcade, 1816-1885）之間的不和，就好像意大利與法國兩國之間的衝突一樣。這場衝突，導致科主教所引入並極力保護的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仁愛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SPC）於裴神父及後來的意大利籍在俗司鐸盎神父（Luigi Ambrosi, 1829-1867，裴神父第二屆任期之後的繼任人）的管治期間遭到嚴重報復。

毫無疑問，並非所有歐洲的發展都對香港天主教教會造成負面影響。一八二九年英國和愛爾蘭對天主教教徒的解放，開關了一個較寬容的局面，讓香港天主教教會可以在香港這一個以英國人和基督新教教徒為政治和社會主流的地方生存並逐漸興盛地發展。

作者的貢獻是給我們第一次較全面地看到香港天主教教會的運作。到目前

為止，關於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歷史著作一直局限於對宗座外方傳教會（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 PIME）、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i Etrangere de Paris, MEP）、方濟會或聖保祿仁愛會等個別修會的研究，又或者是對若瑟神父、高主教和歸信天主教並加入意大利女修會的總督寶寧（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的女兒寶寧小姐（Emily Bowring, 1833-1870）等個別傳教士的研究。毫無疑問，這些著作有其作用，但對於希望了解天主教教會的全面影響及其貢獻和內部動態的讀者而言，它們的價值非常有限。另外，可能是由於香港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而且回歸前的英國殖民地身份，所以研究中國天主教教會的歷史學家對香港的相關情況也關注不足。

在本書對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概括描述中，作者把焦點放在香港天主教教會與其他團體的互動、人際關係、合作以至衝突這些對其發展有較大影響的事件上。正如以上所說，大部分的敵意都是因為國家認同的問題而引起的，但同時亦是因為個人性格之間的衝突和瑣碎的爭拗而引致的。其實，正如作者指出，香港天主教教會只是在受到基督新教的挑戰下才團結一致，除此之外，內部衝突是沒完沒了的。

作者的研究，並非只是對人物作出一成不變的刻畫，而是對一些在香港天主教教會擔當重要角色的人士的想法和行動作出深刻和坦率的分析。特別是對傳信部總務長和宗座監牧的分析，展現了他們妄自尊大、器量小、無情、進取、勤奮、忠誠等複雜的性格。另外，作者同時對一些曾經在香港生活的特殊人士作出了描述。

本書作者在為香港天主教教會加上人性化的一面的同時，並沒有忽略它的

整體貢獻。雖然個別組織和人士之間的衝突確實消耗了大量精力和時間，並影響工作質素，但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香港天主教教會內人士的精神都能讓他們克服一切問題。除了為本地人口的宗教需要服務之外，本書亦詳細記錄了香港天主教教會為病者、盲人、殘障人士、長者、被遺棄的孤兒和婦女所做的大量工作。這足以令我們感到疑惑，為何只有這麼少數目，而且充滿人性缺陷的神職人員和修女，可以為香港社會作出如此偉大的貢獻？

在這個多層面的研究中，最吸引、最令人感動的，是關於中國籍傳教士的事跡。本書首次嘗試就早期的中國籍傳教士，這一群在教會內部只屬低層神職階級的人士的情況收集資料。在當時，雖然中國人是傳教對象，但是歐洲籍傳教士無論在文化上和宗教優越感上，都比中國籍傳教士以至整體中國人優勝。中國籍傳教士只被看作是他們的隨從和下屬，低下程度甚至不准與歐洲籍傳教士同桌進餐。沒有一位歷史學者曾記錄過這些事件，而事實上這些事件亦鮮有被記錄在教會的檔案中；就算真是提及到這些事，一般也只不過是在描述其他問題時輕輕帶過。因此，大部分的記錄都只是一面倒地強調中國籍傳教士的過錯而沒有提及他們的優點和貢獻。基於這些原因，要為中國籍傳教士揭開他們朦朧的面紗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從零碎的資料中為他們的活動和抱負作出一個可信和公平的記錄更是一項英勇的行為。

本書作者甚至透過兩位中國籍傳教士所寫的諷刺性詩文這一件特殊事件，為中國籍傳教士發聲。他們批評高神父對盎神父的苛刻態度，但後來卻被解讀為對教會管治的一個整體抗議。作者艱辛地和寄予同情地為中國籍傳教士重

構他們的困境，反映出他本人對歐洲籍傳教士不單沒有把中國籍傳教士當作兄弟，反而不公平地對待他們的這種行為感到非常不滿。除了道德問題之外，作者同時指出對中國籍傳教士的被苛刻對待和沒有被充分利用他們的技能和熱誠，導致了不良的實質後果，即妨礙了在中國人社會中的傳教工作的進度。

其實，作者清楚地指出了在十九世紀末所實現的香港天主教教會本地化——即把工作重心從中國轉為香港，實際上並非真的做到完全本地化。全面的本地化——即由本地傳教士管理本地教會，是要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才真正開始。對於作為一位中國籍傳教士的作者而言，這明顯是一件可悲的事。

熱愛香港歷史的人士會歡迎本研究為相關的領域填補了不少空隙；而看過本書後，一直認為自己對香港歷史很熟悉的人士也會發現原來還有很多事是他們不知道的。專注探討總督和政府管治、中英關係、中國籍社會賢達、教育問題等的一般歷史著作，通常都不會提及關於天主教教會的歷史，又或者只是輕輕帶過，好像天主教教會的歷史被完全埋沒一樣，即使是基督新教的歷史也比它獲得更廣泛的報道和記載。

作者在本書中描繪了很多我們沒有預料到，甚至從沒有想像過的情境。例如，他對香港天主教教會的財政活動的描述非常引人入勝。雖然香港天主教教會是一個宗教團體，但是它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世俗事務，包括金錢問題。讀者們可能會有趣地發現香港的物業市場並非只是商業機構和個別資本家投機和投資的目標，同時亦是天主教教會的目標，而且天主教教會更是這個市場的主要參與者之一。例如，西班牙的道明會（Dominican Order, OP）在香港擁有大

量物業便主要用作投資用途。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為止，香港天主教教會在香港擁有四十七萬平方呎的土地，而基督新教擁有的土地只有這個數目的不足十分之一。香港天主教教會的財政規劃很受物業市場波動所影響。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時，興建一座宏偉的新主教座堂的資金就是透過出售一間比購入時升值十倍的物業來支付。

這些世俗問題有時會令個別人士或團體之間的敵意加劇，而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會令消耗性的分歧變成公開的對抗。關於宗座監牧盎神父和聖保祿仁愛會之間的糾紛便是一個好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有關糾紛是源於盎神父聲稱對聖保祿仁愛會有管轄權所致。但是聖保祿仁愛會堅持認為她們是受在法國的沙爾德主教管轄的，因此即使盎神父禁制了她們三次，但她們仍然拒絕作出任何讓步。在另一個程度上，盎神父聲稱對聖保祿仁愛會成功地運作，以及並被視為對她們非常有價值的一所孤兒院擁有管轄權。關於該物業的激烈糾紛，最後甚至需要提交給香港的民事法庭處理，雖然在最後一分鐘撤銷了訴訟。但由此可以想像，對香港天主教教會懷有敵意的人在看到這種自相殘殺情境，必定會幸災樂禍。

另外，在描述香港天主教教會的財務活動的同時，作者清楚細緻地列出了香港天主教教會的各項投資、收入、交易的數據，為經濟歷史學者提供了極具研究價值的參考資料。

到了今天，香港天主教教會在社會上各個領域的貢獻都一目了然，但我們對它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卻差不多一無所知，即使一些很重大的事件亦沒有得到關注。例如，很少讀者知道廢除聖公會（Anglican Church）在香港作為法定教會，

是香港首位宗座代牧高主教促成的。他們同時亦不會留意到高主教堅持在香港的政府資助學校教授宗教科，徹底地改變了香港的教育制度。這些事件不單有助我們了解香港的天主教教會，同時亦增加了我們對殖民地政府的態度和工作的了解。這些深入的探索，同時讓我們看到普通人也接受了香港天主教教會的信徒及其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這是一般歷史學家不會留意到的罕有的一面。

除了描述香港天主教教會的發展之外，作者在分析的過程中亦運用了「邊緣化」的概念，顯示出一開始時香港天主教教會由於並不屬於英國人或基督新教，因此在社會上只有邊緣性的地位。不過這也有其好處，因為雖然香港天主教教會需要在缺乏政府的支持下運作，但是它卻享有獨立性並能夠產生巨大的力量去從事牧民和其他慈善福利工作。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在愛爾蘭籍的天主教教徒總督的幫助之下，由高主教領導的香港天主教教會透過勤奮的工作和外交策略，開始在社會上獲得較主流的地位。不過，得到這樣的地位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作為香港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夥伴，並依賴政府肯定其法律地位的香港天主教教會，逐漸變得越來越附和政府，而其身處邊緣性地位時所享有的挑戰和批評政府的機會亦已大大地削弱了。

除了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之外，邊緣化的問題亦適用於香港天主教教會與在香港居住的中國籍人士的關係。這些人與內地的中國人不同，他們並不會明言反對天主教。原因是甚麼？除了香港沒有對天主教持激烈的反對立場的上流社會階級這個明顯的事實之外，是否由於在天主教教會被邊緣化和香港對於中國而言被邊緣化之外，就連中國籍人士在香港也被邊緣化？是否因此令在香

港的中國籍人士也變得較為寬容和思想開明？其實，我們可能會問，這是否置身於社會的邊緣的補償？

這是一個很引人入勝的故事，但沒有太多人會知道。不過，在很多方面，作者憑藉他的特殊身份，有能力向讀者清楚說出這個故事。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依據香港教區檔案處、羅馬教廷傳信部，以及多個位於羅馬、米蘭、巴黎、帕維亞及沙爾德的修會所提供的大量文獻而寫成。這些文獻都是寶貴的發現，但是由於它們的原文都是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或其他歐洲國家的語文，因此只有熟悉這些語文的人士才會明白它們的內容。作者憑藉他敏銳的觸覺，搜尋、驗證和收集了這些相關材料，並以其耐心和精力去有條理地篩選、組織和綜合這大量的資料。作為香港天主教教會內部的人士，作者更以自己對香港天主教教會內部架構、慣例和工作的了解，從獨特的角度去分析這些文獻。不過，同時作為一名客觀和方法論的歷史學家，作者亦兼顧了其分析的持平和明斷。

毫無疑問，對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歷史研究的文獻一直欠奉。本書的博學性，以及書中所提供的大量資料、分析和令人感動的描述，從不同角度把香港天主教教會展現於讀者眼前，引領我們對其作出全新了解，本書確實是值得期待的。

冼玉儀
香港大學榮譽教授

（本序由蔡迪雲翻譯，譯文未經冼教授過目。）

序言

II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一個民族的印記，藏族與藏傳佛教、波斯人與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猶太人與猶太教密不可分，因為他們的宇宙觀、價值觀、道德規範，以至日常生活方式都是由宗教模塑出來的。宗教的傳播，對外地的社會文化帶來改變，研究歷史，不能忽略宗教史。世界史如是，香港史也如是。

羅馬天主教在香港開埠伊始已傳播到這個城市，百多年來，來自意大利、法國、愛爾蘭、美國、比利時的神父、修士、修女在這裡開設教堂、醫院、學校、孤兒院及提供各種社福服務，與香港同步成長，貢獻良多。尤其是教會學校為香港培養了大量人才，成績斐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更是教廷以及各修會向內地傳教的大本營，巴黎外方傳道會在本港開設療養院、靜修院和印刷廠；米蘭外方傳教會（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MEM）、道明會、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 SJ）及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等均設療養院，讓在內地傳教的神職人員可以歇息、療養、靜修，然後再回到內地投入傳道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大批天主教神職人員從內地被驅趕出來，香港又成為這些人的避難所，這都反映了英治時期香港的獨特角色。

天主教與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然而，長期以來這

段重要的歷史與有關的研究及出版書刊的質和量都不成對稱，尤其與基督新教相比更有明顯的差距。究其原因，語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有別於基督新教的有關文獻大多以中英文書寫，港人大都可應付裕如，天主教的記錄除個別如瑪利諾修會及耶穌寶血會（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SPB）外，大多以法文、意大利文甚或拉丁文寫成，能純熟掌握這些語文的人士鳳毛麟角，遑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天主教教會具有悠久的傳統，教廷及各修會之組織及兩者之關係，外人難以明瞭，種種原因導致從事天主教史研究的也大多是神父和修女，但他們日常需應付繁忙的靈性及其他工作，鮮有能投入大量時間從事學術研究，這應是香港的天主教史研究滯後的主因。

近年來，透過堂區及個別修會的出版物，我們可窺見天主教在香港傳播的一鱗半爪，田英傑（Sergio Ticozzi）神父的《天主教掌故》利用天主教的檔案文獻寫成，是迄今認識香港天主教發展較重要的書籍，但該書只挑選了若干主題闡述，有欠全面，而且往往語焉不詳，流於零碎，一直以來香港缺少了一本系統全面性的天主教史，夏其龍神父的這本《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正填補了此一空白。

夏神父研究香港天主教史多年，他對本地天主教史研究之深之廣，絕非其他學者或神職人員可以比擬，本書更是據他年前的博士論文翻譯而成，愚見認為是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 1 全面及深入分析在十九世紀天主教在香港從首建教堂到落地生根的傳播歷程；
- 2 採用了大量教廷及各修會的原始檔案，包括法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